

百年大党以党建理论创新推动强大政党建设的递嬗逻辑及运行机制

宋美桦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惟创新者强”是深刻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的恒久理念。在百年求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走向强大离不开党建理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是强大政党建设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自身建设实践有机结合,切实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中心问题接续作出创造性回答,成就了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史。透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百年创新发展的递嬗逻辑,体知中国共产党人在超越历史局限性和场域适应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党建理论的一贯性思维进路,从根本指向、呈现载体、自信泉源以及落实效能等层面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导向、话语建构、文化蕴含、创新扩散为抓手创新发展党建理论的运行机制,旨在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继续赋能党建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建理论强党; 党建理论创新; 递嬗逻辑;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 D 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1)05-0022-12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1.05.004

党建理论强党是理论强党的首要之义。党建理论如何强党? 惟有创新。作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惟创新者强”是深刻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的恒久理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是助推中国共产党建成强大政党的必要条件之一。经过百年求索实践,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作为其科学行动指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发展中愈加体系化。体系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经过持续创新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建设各方面是紧密相连、相互制约的,因此党的建设科学化、高质量发展不单指某一方面的变化,而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开放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必然需要一套科学化、体系化的党建理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体系化建构是一个连续且贯通的过程,它以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完备性和协调性间的矛盾为重要前提。结合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百年求索历程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协调性之间的矛盾不断以新样态和新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抓住“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条逻辑主线接力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来予以应对,保证了为强大政党建设科学供给理论支持的可持续性。

一、党建理论创新强党逻辑主线: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递嬗轨迹

重视党建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秘诀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自身建设实践有机结合,推动诸多重要而精辟的党建思想在此过程中接续出场,成就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史。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一个接续赋予这一理论鲜

收稿日期: 2021-04-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研究”(17CDJ014)。

明的民族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过程。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百年创新发展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为理论底版,切实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中心问题接续作出创造性回答,在本土化与时代化双轮并驱中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建设道路,从目标指向和布局优化两方面持续不间断地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

1. 建设什么样的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目标理论创新的理性追问

“建设什么样的党”是世界上任何政党都应然明确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各政党在对此问题的理性追问中会因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变换和时代场域的转换而产生不尽相同的目标诉求。无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什么样的党”的理性追问未曾阙如,“党的建设目标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所变化,但始终是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宗旨和历史使命的具体体现”^[2]。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目标追问时一贯恪守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宗旨及其历史使命,但同时又会根据不同时代的历史阶段特征及其实践任务要求灵活调整党建目标的具体指向。

通过积极求索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本土化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行远自迩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本土化创新发展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同俄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列宁党建理论。自这一理论武装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并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布尔什维克化”的建党目标成功吸引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并使之深受鼓舞。在中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他“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3]。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形成“应该变成布尔塞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4]的自觉意识。随着革命环境、革命任务以及党内成员构成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化呈现,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党的过程中对自身建设目标的理性追问思路渐至清晰,尤其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的深刻体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化”导向。基于此,毛泽东完整地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5]这一建党目标,初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中国模式。

党的建设目标与党的政治路线休戚相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一方面通过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党的政治路线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中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明确新的党建目标。努力把自身“建设成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6]并“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6],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更加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现实探索确立的党建目标。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党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改革开放是贯彻执行这一政治路线的题中要义。通过改革不断注入新活力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领导力的有效举措。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生产力和民族精神的双重解放,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称得上中国的又一次革命。这场伟大革命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都要“以自身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带个好头”。基于党自身“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7]并且能够坚强有力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身建设目标指向,明确提出要推动党“能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7],从而使党的建设方向和思路更加契合了改革开放新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要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坚定。在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党建目标。具体地看,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提出了“必须坚决克服各种脱

离群众的弊病,大力加强党风建设,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8]的目标任务;同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在强调“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全党同志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列”^[8]的要求;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把“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这一党建目标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实现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建设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实践新经验,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明确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这一新时期党建目标;在即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之际,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0],这就从指导思想、价值旨意、基本要求、风险防控、先进属性、目标任务等方面更加明确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方向,彰显出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党建基本规律的深化认识创造性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的理性自觉,为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奠定了良好基础。

跨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进入“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1],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切合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实际的党建目标。具体来看,2003年7月,通过总结抗击非典斗争中的基层党建实践经验,胡锦涛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12]的目标;同年10月,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新形势,从党风廉政建设角度提出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中要符合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之后又在12月,在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要“形成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和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队伍”^[12]的目标。2004年9月,通过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并深入分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进行治国理政时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3]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和清醒把握。200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胡锦涛提出要以“党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12]为目标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以上对党的建设各方面目标的具体明确蕴含着把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体目标落实到位的应然逻辑。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总体目标,提出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4],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目标理论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中渐臻完善的充分体现,实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党建目标的系统化呈现。

党的建设目标伴随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不断发展演进,对“建设什么样的党”这一问题的理性追问将贯穿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全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基本原则,认真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目标制定经验,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实践,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5]的党建目标。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党在新时代条件下赓续先进性、彰显人民性、保持纯洁性、富有战斗性、焕发活力性”^[1],这“五大特性”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适应新时代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目标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党以改革创新精神要求自己、加强自己、完善自己的新时代体现。

2. 怎样建设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创新的致思逻辑

党建布局理论的创新水平关乎强大政党建设效能的实现。基于实践由因的时代考量有效回答“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问题域中看党的建设布局的实践张力与理论阙如如中国共产党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党建布局理论的致思逻辑。从党的建设百年实践进路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党建布局的思想既实现了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理论承袭,同时又通过突破其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和论断创新性地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在总体上指导了强大政党建设扎实有序推进。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初期开基创业的弱小政党发展成历经百年磨练愈发成熟稳健的世界第一大党,离不开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自身各个方面建设的合理布局。为了能够在各革命阶段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号召力、战斗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各革命阶段的实际需要进行党的建设初始布局,形成了以思想建设为首、以组织建设为基、以作风建设为重的体系结构框架。首先,把从思想上建党置于党的建设布局体系之首位予以高度重视和突出强调而逐步形成的思想建党理论,构成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比如,在反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次路线错误中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上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16];对于党内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党员,提出要及时“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17];在深刻意识到党内成员种种错误思想的生成与党的组织基础成分构成有关时,提出要“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18],并提倡通过推动共产主义教育常态化发展来激发全党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积极斗争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些有关思想建党的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史的重要元素。其次,在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组织力量。作为一个为满足中国革命客观需要而成立的政治组织,“扩大自己的组织”、实现“组织上完全巩固”是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阶段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目标。经验表明,“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17]。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16],正确的组织路线要靠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来保证。为了达到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16],做到“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同时还规定了“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16],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再者,在作风建设方面,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优良党风服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在革命实践中,为了应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党风不正问题,比如历史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一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原则遵循的整风运动,使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16]。由此,他提出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以及认真自我批评等方面来塑造党的正派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总体而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中有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原理同自身建设的具体实践进行实事求是地结合,初步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齐足并驰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考验,对党的各方面建设也提出了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推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同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布局党的建设路径,构建了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为基本组成单元的党建体系框架。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解放思想,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把“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滞留在党内的封建主义残余对改革思维的阻碍影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开放思路的浸染侵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意识到“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3],

明确提出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改善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3],而能否选好接班人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的关键。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3]的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3]。在如何选好接班人这个战略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组织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建设性观点和可行性政策,比如提出新时期领导班子建设标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队伍、确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等等。在作风建设方面,提出通过整党“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19]。党的作风既具有一贯性和稳定性,又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党风问题提升到关系党之生死存亡的高度,明确指出搞好党风“必须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7]。在制度建设方面,把制度问题看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3]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党的建设要走出一条“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7]。在不断完善党内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制度思维贯穿党的领导活动和执政实践的全过程、各环节,使党的领导活动和执政实践更加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同时以各项规章制度规约引导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继而在党内形成强大的制度效应,为增强党的战斗力提供更具根本性的保障,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重要贡献中内蕴着丰富的制度建党思想,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监督制度、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内容,促使全党在实际工作与日常生活中循制而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国内改革全面继续深化推进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让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面临改革开放的考验、执政的考验以及国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考验,同时还要面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发展的新考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20]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切体认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结合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经济政治体制的新变革、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以及党员干部队伍结构的新调整对“怎样建设党”予以布局思考。基于此,江泽民提出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作为“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11],把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承担起从严治党“全面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工作,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21]的落实责任。此外,还着眼于党的建设实际问题,在“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同时,提出“制度建设必须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9];从政治上推进党的建设时不仅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要求,还明确了“这里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9];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提出要“始终抓住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21]，“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11],同时也注重“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11],强调党的基层组织要从各自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长期来抓^[9]，“提出在反腐败中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还根据“三讲”教育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10]。这都体现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14]的新要求映照在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自觉逻辑,搭建了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为基本架构的系统布局。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既展示了党的建设体系中各种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又

呈现出党的建设体系的整体结构和完整框架,从而有助于我们全方位、系统化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发展规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各要素的构成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演变与党所处的时代环境、所担负的中心任务、所面临的风险考验以及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等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2007年,中共十七大从总体上对党建工作进行布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工作进行总体布局的同时,还着眼于这一时期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强调了党在各方面建设的重点。比如,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强调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22];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强调要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还明确提出“党性修养是每个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22];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强调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从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工作上都不能脱离群众;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强调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使党的各方面建设能够朝着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继续推进;在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针对拒腐防变这一历史性课题,强调要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坚定不移地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反腐倡廉建设自党的十七大开始在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中有了独立地位,“党的建设因此发展为‘五位一体’的新布局”^[23],构成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的重要篇章。

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总体布局内容是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发展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从政治、思想、纪律、制度、反腐败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要求的适应调整。首先,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遵循和传统应然赓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政治建设首次以“统领”“摆在首位”“党的根本性建设”等话语表述方式亮相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践中结合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和党内外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重要研判,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其次,重视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15]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思想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崭新功能地位。从以往的“首位”地位到而今的“基础”地位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定位认知更加深刻。把思想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建设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来说具有强基垒台的作用。再者,突出强调党的纪律建设并将其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围绕“为什么要将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以及“新时代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新要求,创新了推进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可行性路径,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布局理论。另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24]“笼子”的松紧度直接关乎党的建设效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方面建设之中的新要求,既突出了制度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努力向度。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已夺取压倒性胜利,但巩固发展这一压倒性胜利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依然不容小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念和思想,促进了反腐败斗争格局的新发展。以上调整使新时代党的建设在布局结构上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体系化。

二、党建理论创新强党实现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运行机制

党建理论创新强党之言,信而有征。经过百年奋斗求索,“有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指导,才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巩固、壮大”^[9]已是经由历史和实践检验过的事实。这一事实内蕴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容量。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接力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积极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创新运行机制,成为实现党建理论创新强党的有力支撑。

1. 实践导向机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根本抓手

任何一套科学理论体系都有符合其自身发展特点的实践逻辑导向。不断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实践逻辑导向,既有利于检验这一党建理论体系的效度和限度,也有助于推动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走深走实。以解决自身建设问题和提高自身建设质量为运行中轴逐步建构、发展和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为根本遵循,而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最好的坚持就是结合自身建设实际不断创新发展。披览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百年求索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一贯坚持以发现并解决党建问题和提高党建质量作为强化其实践逻辑过程中最直接、最鲜明的导向。

(1)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党建理论的首要前提是善于发现问题。问题“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25],是推动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伴随着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深入推进而出现的各种复杂性党建问题不仅蕴蓄着对完善党建理论的吁求,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创新能力。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效运用已有党建理论指导解决经常存在的党内突出问题,更要善于通过发现党内崭新问题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敏锐察觉党建场域存在的新问题,以此为导向明确党建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与发展方向是党建理论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以问题为导向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是避免以问题为导向创新发展党建理论的设想因缺乏实际针对性而流于形式主义的根本保证。善于发现党建场域存在的新问题旨在及时解决而非视若无睹。中国共产党把成功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新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就是一个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将在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升华新经验—生成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发现新问题这样周而复始的运转中更臻完善。

(2)以高质量党建实践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设。当党的建设实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将更加趋于成熟定型;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契合推进党的建设的必需限度时,又有助于推动党建实践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成熟程度低于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必需限度时,则意味着这一理论体系尚有可创新发展空间。作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范式对自身建设质量问题作出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条分缕析和辨察克治。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范式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质量为重心,以推进作用于中国共产党持续健康发展的各项具体建设(比如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为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分析视阈而形成有机整体。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范式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国共产党处在不同历史方位所生成的党建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其基本定型应该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日渐完善为前提要件。中国共产党处在不同历史方位建构起带有不同时代印记的党建理论体系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一般范式,又在具体内容、侧重方面、地位影响、价值意蕴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结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党的历史方位是指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中所处的方向和坐标。”^[26]现如今,由于所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新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认识自身建设规律,促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更加合乎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逻辑,加快了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建设步伐。

2. 话语建构机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呈现载体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建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话语呈现或表达形式”^[27],其建构是一个有助于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明确话语身份、掌握自身建设“话语权”和规范党建话语表达的过程。这一过程承载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价值需要,同时它又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内容为基础不断实现新的发展。作为特定思想理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外在表达载体,话语因与行为、权力、交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而成为当今政党政治场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建设“是推进政党自身文明发展和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动力”^[28],不同政党在自身建设场域中生成的思想理论成果应以正确合理且实事求是的政党建设话语来呈现。自现代政党滥觞于西方以降,各国政党逐渐形成一种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政治理论、政党叙事、伦理价值来解释、分析并规划本国政党建设道路的惯性思维。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百年求索实践中努力打破这一惯性思维的桎梏,在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基本原理与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党建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

(1)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话语表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进行话语分析,努力跳出以西方政党建设为标准的话语窠臼,总结提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话语表征,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的现实逻辑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程度方面来剥离出其中的制约因素,积极建构切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际的原创性党建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拓展强党建设道路的应然选择。当今世界上盛行的许多政党建设话语是基于西方国家政党建设实践生成的,在这些政党建设话语中,一部分反映了现代政党建设的共通性特征,但也有一部分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政党建设的某些经验性事实或偏好性价值。具有共通性特征的政党建设话语因符合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呈现出普遍适用性,能够帮助非西方国家深化对现代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非西方国家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但是,如果将那些只反映西方国家政党建设特殊规律的话语直接移植到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建设实践中,就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政党建设的话语生产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社会实践基础,如由来已久的多党竞争制度、大力推崇的自由主义、底蕴浓厚的宗教文化、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等,由此孕育出一些只符合西方国家政党建设特殊规律的话语,不仅在表达上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和涵盖所有现代政党建设事实,而且使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生产向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党建设理论也不能科学、合理地指导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建设实践。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共性,但基于事实比较来看,东西方不同类型政党之间在自身建设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差异,固然不能生搬硬套彼此的政党建设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政党建设思想与经验。为避免落入被西方国家政党建设标准“牵着鼻子走”的话语陷阱,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构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在理性认识自身建设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上,探寻了符合特点、贴合实际的概念、范畴、命题、论断等阐释自身建设实践。比如“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理论强党”“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面从严治党”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话语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价值体现,同时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元素。

(2)适时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话语方式。中国共产党处在不同历史方位和各个历史时期选择用不同风格、不同特色、不同气派的话语方式来表达系统一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其表达力、沟通力、传播力、影响力会有所不同。真正有价值的政党建设理论就是既要满足学术场域内的自圆其说,又要符合实践逻辑中的现实关切,但无论是学术场域内的探索争鸣还是实践逻辑中的传播宣介和贯彻落实,通常都离不开政党建设话语方式的自觉调适和适时创新。为了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能够通达全党与沟通世界,需要建构一套更具表达力、沟通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党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只有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才能真正具有影响力。”^[29]政党建设话语方式在政党建设话语能否得到传播和认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各政党在探讨和交流政党建设思想与经验时,难免受信息鸿沟、地域偏见、视野局限、文化分歧、理念差异、利害相权等因素的影响

而导致话语障碍甚至是话语冲突,由此便会影响政党建设话语的传播效果和认可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场域的百年求索实践中,为淡化并消除政党建设场域内存在的话语障碍或话语冲突,采取实事求是、言之有道、行之有效的党建话语方式强化党建话语的表达力、沟通力、传播力、影响力,在增进与其他政党间的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中不断提升加强政党建设方面的话语权。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与党建理论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关系来看,成熟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的基础性支撑要素。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采用实事求是、言之有道、行之有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方式继续强化党建话语表达力、沟通力、传播力、影响力的过程中,需将创新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持续夯实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政党建设自信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创新完善过程中,又需将实事求是、言之有道、行之有效的党建话语方式作为提升其通达全党与沟通世界能力的一个重要抓手,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坚定政党建设自信的话语优势。

3.文化蕴含机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自信源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溯源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且合乎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要求的理性结果,但因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数千年赓续未断的中国社会,故而无法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淬炼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文化,进而在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坚持中生成了反映其内在规定性的党建文化。于此意义上来说,党建场域不单是一个紧密关联国家命运、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政治空间,还是一个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垒筑建构的文化空间。党建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政党建设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提升点,它伴随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渐进性实践理路日益形成并发展繁荣起来,不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完善供给精神营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高度、深度、效度及温度。中国共产党在思考并分析如何继续创新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这一问题时,不仅要主动辨识出党建实践逻辑域中各要素不断发展变化的事实,同时也要能够抓住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完善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由此更加坚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文化自信。

(1)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中培育深刻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30]虽然几千年封建专制政体下的古代中国未能提供现代政党政治场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环境,但这并不全然意味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未曾生成可供党的建设汲取的思想养分和经验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有优劣之分、精华与糟粕之别,其中封建的、糟粕的部分“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31],而优秀的、精华的部分则是一种巨大的助力,是历史的推动力。那些积淀着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治理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植根的精神沃土,为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讲话中经常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引经据典,比如,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告诫全党反腐败斗争的客观必要性、以“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来警惕理想信念动摇或丧失的高度危险性、以“己不正,焉能正人”来明示管党治党真敢严的内在必然性、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来强调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以“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来提醒全党必须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相连的立场坚定性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因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而使其逻辑架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能够在推动创新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继续保持这一稳定性就需要不断强化文化自觉。“没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坚定的文化自信。”^[32]在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突破外来文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进行文化反映的种种遮蔽,清醒认识并合理引导党建文化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2)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中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摄取和文化样态,呈现出对不同时期党建问题所作的理解与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对不同时期的党建问题作出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接续回答,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文化表征在不断丰富的过程。如今,中国共产党要把自身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将涉及如何让世界各国政党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就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尤其要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故事背后的理论。回望百年求索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故事里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承载着丰富的党建文化。党建文化积淀着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求索实践中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党建文化,在表明政党身份、展现政党形象、凝聚政党智慧、增强政党感召力和吸引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其软实力的一种真切彰显。为了增进与世界各国政党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让世界各国政党在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展开政党间对话,进而在“政党—国家—人民”的复杂关系中凝结出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客观评估党建文化在促进世界各国政党间有效沟通与对话合作中的独特作用,还要正确看待党建文化在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双重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坚定的党建文化自信。党建文化自信是一个政党持续健康发展中更强大、更深层、更稳固的能量源。中国共产党要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故事背后的理论离不开党建文化支撑。通过树立党建文化自信推进强大政党建设的理论诠释,应纳入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部署要求和工作安排之中。

4. 创新扩散机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创新理论的落实保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生成于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较强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囿于一隅的书斋式教条理论,而应该发展为与时偕行的务实性科学理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继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从理论武装跟进理论创新的媒介场域和时间限度这双重维向来看,这些新的内容作为党建理论创新成果要被广大党员彻底弄懂吃透并付诸实践绝非一蹴而至,它们需要时间酝酿和空间扩散。扩散是一个必须满足“某创新在某时间段内通过特定的沟通渠道在某社会体系成员里传播”^[33]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扩散就是党建理论创新成果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大众媒介和人际网络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党建理论创新成果能够被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所理解、接受、掌握、应用为重要旨趣。各级党组织在传播扩散党建理论创新成果时不应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应循序渐进地展开,否则就容易导致部分党员对此消化不良而适得其反。因此,把健全创新扩散机制嵌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运行系统中,以此来推动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直达党建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党建理论创新与实践效能转化之间张力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1)积极建构全媒体协同宣传和扩散格局。纵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所走过的百年创新发展历程,其创新成果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扩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扩散,都在推进党的建设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推进党建理论创新成果作用于党建实践的各项工作中,也不乏存在一些因创新扩散强度不够和效度不高而导致部分党员甚至是党员干部对党建理论创新成果认知不充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这难免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造成负面冲击。而今,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建理论创新成果宣传扩散如何作用于党建实践的承继性认知和创新性认识。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在全面宣传扩散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差距、突出问题进行科学研判、敏锐识别并及时调整完善,采取多种形式增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进一步强化这一理论体系创新完善的目标导向并压实其使命任务,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过程中需要面对且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建设实践提高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的强度

与时代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策划

和效度,离不开来自平台载体建设和语言风格塑造两方面的助推。一方面,在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不同媒体平台各具不同属性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它们所能承担的不同责任和发挥的不同作用,积极探索主流媒体平台与社会媒体平台、传统媒体平台和新兴媒体平台联动统一发力和充分融合发展的高效方式,多方位拓展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渠道和扩散空间。另一方面,在推进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中主动接受宣传扩散环境对党建语言表达提出的要求,促使党建理论的语言表达在承载党建实践发展要旨的同时也符合其创新成果宣传扩散的实际需要。通过塑造党建理论内容的语言呈现风格并完善其语言表达机制来增强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的强度与效度,这一举措的根本动力源自广大党员应把党建理论常讲在嘴、铭记于心、落实至行。实践表明,精准明确、科学严谨且简明易懂的党建语言表达,能够助益于提升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的强度与效度,为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主动参与到创新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提供保障。

(2)全党自觉提升创新成果扩散基本素质。对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成果进行宣传扩散旨在促使党建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推进党建实践的真正动力与可利用资源。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成果经由“人际传播”,各级党组织和每一党员个体在这一过程中集解释者、传播者和执行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他们对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认知状态和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宣传扩散效果。各级党组织和每一党员个体所处特定的党建实践场域和需要解决的党建具体问题大致规定着党建理论创新成果宣传扩散的内容和形式,由于不能全面掌控每一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扩散成效和落实质效,从而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党建理论创新成果宣传扩散的强度限制和效度偏差。通过激发和引导各地区、各领域、各层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理论知识,摆脱对党建理论创新实质理性认知不平衡的现实困厄,需要在党建实践语境对党建理论内容的规定性中匹配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所需要的理论素养。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扩散予以自觉重视并认真落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置身于党建实践场域内如果没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有效的理论落实,单凭主观想象和传统观念臆解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深刻内涵及重要意义,那么在宣传扩散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过程中断难彻底贯通并说服人,这就极易让党建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扩散耽于形式主义,从而给心怀叵测之人质疑、批判甚至是诋毁党的自身建设能力以可乘之机。从党的建设实践状态和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成果宣传扩散成效及其主体的理论素养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来看,在整个党建实践体系中处于薄弱环节的党组织或党员倘若不具备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成果宣传扩散所需要的理论素养,不仅难以真确领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实质理性,甚至连正确把握其功能理性都面临不少困难。鉴于此,在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成果作用于党的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各地区、各领域、各层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党建理论创新内容宣传扩散工作中应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过硬的理论素养自觉占据主动权,充分发挥宣传扩散效应助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的特殊作用,这也符合进一步提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发展成果之解释力度、引导能力及其应用价值的需要。

三、结 语

中国共产党立志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这既需要自我革命实践的有力锻造,亦离不开科学党建理论的创新塑造。经过百年实践求索和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在逐步走向强大中自觉强化最新党建理论武装,构建了对自身建设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党建理论框架,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成为强党建设链条上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现如今,世界与中国每时每刻发生的变化在激发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动力,也必然作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正以超越历史局限性和场域适应性的强大穿透力整合着自身稳定性与适应性、完备性与协调性之间的张力,从根本指向、呈现载体、自信源泉以及落实保障等层面深化着以实践导向、话语建构、文化蕴含、创新扩散为抓手的运行机制,持续为党的建设实践系统的顺利运行供给最新党建理论武装。实践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行之有效,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现强党宏愿助益昭彰。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各类党

建新问题、新思路、新模式和新业态继续不断涌现,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实践诉求催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形态。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布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快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需着眼于对党的建设质量问题的理论思考,高度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向度,正确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完善过程中的系统性原则与差异化作为,深刻认识党建理论创新设计与创新运行之间的关系,积极塑造党建主体与党建场域之间的良性交互,继续铸牢基于强党建设实践的党建理论创新意识,在深刻把握党建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党建理论结构优化升级,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创新的高质转型中赓续理论强党,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提供更多理论支持。

参 考 文 献

- [1] 张荣华,宋美桦.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价值意蕴[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23-30.
- [2]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1]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2]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1] 宋美桦,张荣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设的经验启示[J].齐鲁学刊,2019(1):85-91.
- [22]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3] 齐卫平.十八大创新党的建设的六个关注点[J].江西社会科学,2012(11):5-11.
- [24]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25] 培根.最伟大的思想[M].王屏,王泽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 [26] 张荣华,梁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三大转变[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56-62.
- [27] 赵绪生,孙进宝.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5):38-46.
- [28] 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235.
- [29] 韩强.十九大与党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98-103.
- [30]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7.
- [3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3.
- [32] 张友谊.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N].光明日报,2017-11-29(11).
- [33] 埃弗雷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5版.唐兴通,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13.

(责任编辑:金会平)